

黄亚光日记

魏协武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 新登字 001 号

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

HUANG YA GUANG WEN GAO

HE RI JI ZHAI BIAN

魏协武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西安市建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625 印张 8 插页 234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4—04330—3/ K · 699

定价：22.00 元

出版说明

黄亚光同志是党的金融事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对我国革命金融事业，尤其是货币设计，有过特殊的贡献。近年来，我们挖掘了黄亚光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期间的部分文稿和日记，将它编辑成《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出版，作为向中国人民银行成立50周年的献礼！

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毛主席指挥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是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成长和边区金融事业的发展，及其对边区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做出的重大贡献，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金融和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的伟大胜利。黄亚光文稿和日记，翔实地记述了这一历史变革。黄亚光作为边区银行的领导，参与了边区政府、西北局和党中央的许多活动，所以也部分地记述了边区的发展和党的历史。

《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的出版，不只是为学习和研究革命金融史提供可靠的资料，重要的是它将对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继承革命先辈的艰苦创业精神，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整理摘编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

由于半个世纪前历史条件的限制，文稿和日记的纸质低劣，字迹不清，和一些用语不同，经过再次复印，更加难以辨认，得用放大镜推敲判断。有些篇章本来较为重要，却因模糊不清，无法选用；有些篇章虽较一般，但与某一事件有一定的联系，还是编入了；对个别有明显错漏的字句，作了必要的处理；不能辨明的字句，用相应的 代替；有些不便署名的人则以×××代之。由于水平有限，摘编不当和错误在所难免，衷心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赐教。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的重视。戴相龙行长亲自批示总行办公厅“关照支持”，原副行长乔培新欣然为书稿题词；总行金融研究所原副所长周世敏、中国金融出版社原总编许树信，不仅提了许多宝贵意见，还亲自参与编审和为书稿作序。总行办公厅、教育司、陕西财经学院的领导和甘勇处长、赵金铎教授，以及陕西省分行、延安市分行、福建省金融研究所的领导和有关同志，也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1997. 7. 1 香港回归之时

序

黄亚光同志是 1926 年参加工作的老革命，是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工作的金融战线上的老前辈，又是多年从事银行领导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解放后，我们两人都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所以我们习惯地称呼他为黄行长。黄行长在参加革命时就是位知识分子，能书善画，才华横溢。他的毛笔书法很有功夫，蝇头小楷细密整齐。也写得一手好钢笔字，工作笔记非常工整细致，特别是他有一个可贵的习惯——坚持每天记日记。《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就是他从 1940 年到 1946 年所写日记的选辑。1997 年乔培新副行长（他的老战友，在延安时曾任边区银行业务处长）看到这部书稿时就说过：在延安时，领导同志坚持写日记的不多见，这部日记能够留存下来，实在是宝贵的财富。把它整理出版，是件大好事。

我们有幸读到这部日记，很受教育，很受鼓舞。黄行长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难能可贵。正是由于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坚持记日记，才使得我们有了第一手材料了解到在延安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同志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某些侧面；了解到陕甘宁边区银行同志在当时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情况。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里，边区银行的同志们如何想方设法印制发行边币；作市场调查，稳定金

融；积极贷款，支持经济发展；搞生产自救，种粮、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时还开展了各种文体活动，体现出同志们的革命乐观主义。凡此种种，在黄行长的日记里都有生动的反映，字里行间闪烁着“延安精神”的光辉。因此，这部日记实际是陕甘宁边区银行同志的革命实践的缩影，很值得一读。

读了《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使我们不禁回忆起解放后和黄行长相处的日子。当时他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单位的主要领导之一，而我们是一般干部。在日常接触中，看到他工作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的身体不太好，但经常加班加点，披阅文件或找人谈话。他在党内从不以领导自居，按规定参加组织生活，支部书记和党小组长都是他的下级科处级干部，而他则经常主动向党小组汇报思想。他表面看来挺严肃，不苟言笑，但实际上对我们非常和蔼可亲。他高贵的思想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当然，《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也有它的局限性。由于它是日记体裁，所以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背景等记述的比较少。又由于它是私人日记，所以边区银行的业务工作和活动记述的比较少。这虽然是个缺憾，但我们认为，读者只要把它与有关的史籍结合起来阅读，定会给那些干巴巴的史料增添不少鲜活的内容。

周世敏 许树信

1998年9月

目 录

序	周世敏	许树信 (1)
概述		魏协武 (1)

第一篇 文稿选辑

信用合作社与边区银行的关系	(21)
与中国记者的谈话	(23)
边币发行的目的和作用	(28)
边区金融小史提纲	(30)
抗战结束阶段关于边区银行金融工作的检讨	(52)
物价难于稳定，比价必须稳定	(69)
行长联席会议决议草案	(72)
一九四七年陕甘宁金融贸易工作报告	(83)

第二篇 日记摘编

一九四二年	(101)
一九四三年	(133)
一九四四年	(150)
一九四五年	(188)
一九四六年	(234)

第三篇 访谈与怀念

- 黄亚光行长率领陕甘宁边区银行转战陕北
..... 周世敏 许树信 (299)
- 坎坷一生清白在，为党为民意志坚
——黄亚光生平简介 魏协武 (306)
- 访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货币图案
设计者——黄亚光同志 张新明 (309)
- 黄亚光同志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货币的
设计 张建新 (312)
- 革命老人的拳拳之心
——访红军老战士黄亚光同志 庶 纪 (318)
- 老行长的心愿
——访黄亚光同志纪实 魏协武 (329)

概 述

魏协武

陕甘宁边区银行从 1937 年 10 月成立，至 1947 年 11 月与晋绥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历时十年。先后三任行长，黄亚光的任期即达六年。坚持记日记是黄亚光的一大特长，在筹建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的过程中，就曾闻悉黄亚光的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但经多方查找都未得到日记的一点线索，就连黄亚光本人及其家属也都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

挖掘黄亚光日记是件有意义的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奔波，终于在陕西省档案馆保管的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案卷中发现了日记的复印件，这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资料啊！1986 年全国金融会议提出，金融职工都要记日记。记什么？怎样记？能否坚持？多数职工感到疑惑。原打算把黄亚光日记整理出来，介绍给广大金融职工，有利于记日记活动的开展。通过整理，发现黄亚光日记不仅解决了记日记的方法和内容问题，也不只单纯为我们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而且是一个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是革命先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黄亚光日记摘编是从黄亚光 1942 年 6 月调边区银行至 1946 年底，4 年又 7 个月的时间里，近 50 万字的日记里遴

选出来的。包括文稿在内，既体现了黄亚光的革命风范，又反映了边区广大金融工作者，在革命摇篮经受锻炼的情景；既体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和边区党政军领导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又反映了边区金融事业的巨大成就和历史贡献，内容是十分广泛和丰富的。

一、黄亚光同志是一个饱经沧桑，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黄亚光出生在一个富有家庭，在肃反错误的屠刀下没有动摇，毅然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环境相对稳定了，官做大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信念始终没有变，对革命充满了信心。“‘窗隙透鱼白，小儿呼天光’。1943年的开始，带来了生产与教育两个中心工作。在银行怎样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布置工作，随时涌现心头。”这是黄亚光1943年元旦日记的开头语。新的一年开始了，银行工作如何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是他考虑的首要问题。黄亚光在1944年元旦的日记里写道：“今年是法西斯将要倒霉的一年，中国新民主主义将要更加发展的一年，困难的克服虽然还待我们去百倍的努力，但肯定的光明前途是展开了。”是的，边区在党中央毛主席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下，不但生存下来了，而且战胜重重困难，实现了“耕三余一”。正如他在1944年1月24日的日记里写的那样，“今天是1943年旧年的最终一天，万家灯火照耀各个山头，延安宛如香港之夜，已一变几年来荒凉之气象。环顾革命与战争的环境，尚须我们百倍的努力，我们在陕北屈指已十年，比诸中央苏区还更巩固。再过二年将不是今年的面貌……。”

黄亚光同志长期做领导工作，他不是做官当老爷，始终

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废寝忘食地工作。亲自起草文件撰写报告，亲自整理资料统计数字，亲自做调查研究。他不尚空谈，善于在实践中掌握第一手资料，做出正确的判断。通过黄亚光日记，不难看出他的工作是很有节奏的，忙而不乱，卓有成效。在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礼拜和节假日，没有上下班和昼夜之分。往往通宵达旦地学习、写材料，研究工作。为了掌握边、法币斗争的主动权，有力地打击黑市活动，他经常活跃在延安一些大的商号客栈，了解市场行情，随时调整比价。1944年8月中旬，黄亚光积劳成疾，发高烧至41度，还在坚持工作，经中央组织部部长兼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陈云同志的督促，才被迫住院休养。9月中旬刚刚出院，就和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等一起赴子长、绥德、米脂、佳县等地调查，摸清了边、法币的流通范围和规律，提出了扩大边币流通的办法。1942年8月2日，黄亚光的夫人吴桂芳问黄八路军的几个师的番号和负责将领的姓名，黄答不上来。对一个金融工作者来说，这算不上什么问题，黄亚光则不这样认为。他说自己作为八路军之一员，这是熟视无睹，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主观主义作风，是自己身上的一种毒素。当即去翻资料了解和掌握这一情况。

做工作就会有错误，检讨、自我批评对那一代人来说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坏事。他们把检讨和总结工作等同对待，从上到下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从而推动工作不断前进。1942年8月1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在参议会常务会议报告中对政府工作提出五点建议：记日程功，反对拖延；学习业务，培养专才；注重领导，月计有余；善成法治，实行民主；希望注意干部健康，特别是领导

干部的健康。黄亚光认为这不仅是针对政府工作同志的缺点，正是针对自己的缺点下药的。他说来银行几乎两个月了，了解情况是粗枝大叶的，日计有余，月计不足，今后要抓住中心好好的去做一番。1943年12月17日，西北局召开会议讨论财经工作，财政厅、物资局的同志发言后，黄亚光自觉地检查金融工作，他说“今年下半年我们没有负到应有的责任，使边区金融大紊乱，黑市上涨到1600—1500，物价高涨14倍多（小米）。其他生产战线上的经济工作都好，唯有财政金融工作不好。金融这样紊乱，表示了我们无能。”

那个年代同志间的革命情谊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建立在批评与自我批评基础上的，尤其在离别时总要互赠几句肺腑之言。1945年10月，曹菊如要出发去东北了，这两位经过长征的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老战友，难舍难分。临行前还相互检讨，曹菊如说自己主观，黄亚光检查有些寡断，决定问题不爽快。这种精神今天几乎是看不到了。

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能成为制度，一是领导带头，严格要求。二是注意做善后工作，开展谈心活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十分受人崇敬，人们尊称“林老”，是“七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中得票最多的代表之一，在党团会上主动做自我批评，黄亚光说这对他教育很大。1942年11月参议会大礼堂讨论党政军民关系，一些部门做检查，林老要求：脱掉帽子，割掉尾巴，抓住中心，出门见山。接受批评有时也是不好受的，但能正确对待。1944年3月9日，黄亚光被西北局领导批评为“张伯伦”，他入夜回银行很不舒服，在日记中说“不自觉未遵守停发决定，又一次教训了我，认识时要绝对弄清白，否则会出岔子。”黄亚光有受领导严肃

批评后不好受的亲身体会，所以他也很注意被批评者的情绪。1946年7月29日支部会讨论刘小明的鉴定，指出其有能力外，强调其缺点有五，批评后刘小明思想消沉，黄主动找他谈话沟通思想。他经常利用晚间开展谈心活动，谈工作，谈思想，虚心听取批评建议，主动改进工作，有效地密切了干群关系。

忠与孝，是每一个革命者都会遇到的问题。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衡量一个革命者如何对待公与私的重要标尺。黄亚光远离家乡，多次接到家书，母亲脚烂不能行走，女儿生活困难……这些问题曾使他心酸难过。但是为了革命工作，他都以书信安慰，拿出自己节余的津贴费给以接济，有时还得向别人借钱寄回，他从来不向组织伸手喊叫困难。但对下边的同志却是十分关心的。三边分行张维培行长家庭生活困难，他主动安排给予补助。调研处长苏子仁（乔培新）病了，他不仅安排住院治疗，还派人送药、送食品。在苏子仁病情严重时，他又亲自到医院与院领导商量减轻在医院工作的苏子仁的爱人曾明霞的工作，以便腾出精力护理苏子仁。1946年7月10日，边区政府送他两包联合牌香烟，他也要分一些给张定繁副行长等同志吸。这件事在今天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在当时大家都吸旱烟叶的情况下，谁要是能抽到一支进口烟都是十分荣幸的。

革命战争年代是很难有机会脱离工作岗位专门进学校学习的，得靠自己有毅力，边工作，边学习。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黄亚光同志大都利用早晚的时间读书看报，从政治到业务，做什么学什么。《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文件不知学了多少遍。为了夺取边币与法币斗争的胜利，他经常研究

国民党的报纸，从中寻找信息和研究斗争策略。他坚持做读书笔记，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他说：“写反省，这是读了文件（文件是理论）与革命实践（反省）相联系的尝试，反省本身要为自己而作，那么我过去的写法似乎有点不合拍了。”黄亚光撰写了许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讲稿，向职工，向延大学生讲授金融课、宣传金融理论，宣传边区的金融工作。黄亚光就是用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由实践者成为一个具有相当水平的金融理论家。

黄亚光也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在那样繁忙的情况下，只要有一点业余时间就要得到充分的利用。边区银行每个周末的跳舞晚会，他几乎都要参加，看戏打扑克也都离不了他。散步也要和同志们同行，既活跃了生活，又增进了同志间的革命情谊。黄亚光与同志之间的交往是十分频繁的，不难看出他的人际关系是融洽的。

二、战时银行的中心任务是发行货币，保障军需民用。而开展货币斗争，稳定金融物价则是保证实现这一任务的主要手段。

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于1937年10月1日。西安事变后，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协议，边区不成立银行，不发行货币。所以当时边区银行对外不公开，实际是财政的支付机关。经费靠每月在西安领取国民党政府发给的军饷，一部分通过经营光华商店购回边区急需的物资，带回延安作为军饷发给机关、部队、学校。边区收回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苏票”，流通国民党的法币。因军饷大都是主币（法币），辅币十分缺乏，市场出现用邮票等找零的现象。迫使银行在维护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从1938年起，发行了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和七角五分的“光华商店代价券”，

作为法币的辅币流通于市场。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完全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法币有出无入，边区军民面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严峻形势，为了度过难关和抗议国民党的背信弃义，边区政府做出了禁止法币流通和发行边币的决定。边币于1941年3月投放市场，5月即出现金融波动，一些地方公开拒用边币。在发行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有政治保证可以无限制发行；要度过财政困难，不能不无限制发行；筹码不够不能不增加发行，被称为无限制发行论者。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票子多了，物价则涨，不能发行；商品少，货币多，不能再发行；外贸不平衡，发行要减少。被称为保守的发行论者。本来两种观点都有它的片面性，而银行的主要领导基本都倾向于后一种认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迫使银行不得不大量发行，先后两任行长都因此而被免除职务，甚至被戴上金融本位主义的帽子。黄亚光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银行第三任行长的。1942年12月毛主席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不仅为发行工作，而且为整个财政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但是这一方针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1943年边区生产自给等项经济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惟有金融财政没有做好，受到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严厉批评。

1944年采取“大吞小吐”的方针，使金融物价得到了相对的稳定，但仍有两个问题摆在黄亚光的面前。一是在市场占领上出现边币独占边区市场和绝对消灭法币黑市的论点，也有人主张“边、法币同流”；二是边、法币的关系，是落实在比价上还是落实在物价上。这两个问题在“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方针指引下，经过热烈的讨论，在黄亚光的任期内，从理论到实践基本得到了解决。

边区 31 个县市 280 个区中，有 24 个县 81 个区与国民党统治区边境交错，约有 40% 的地区人民要用法币；边区的一部分物资也要由外面输入。一面要打击法币，一面还要套取法币，以供交换。所以边币独占市场是不可能的，绝对取缔法币也是不现实的。因为法币的腿长，流通范围是全国，边币流通范围只限边区。以法定的比价不能完全求得法币时，必然有黑市的发生。“边、法币并流”更是不可取的，这样边区市场就会被法币占领。边币与法币必须在边区市场上分离，同时又必须在对外贸易上相互联系起来。边区政府一面颁布禁止法币流通命令，和制定违反金融法令惩罚条例，一面又在各地成立货币交换所，从事边、法币的兑换。开展边、法币斗争，是稳定金融、保障边区正常经济生活的大事，边区党政军对此极为重视，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亲自抓这一工作，及时调整比价，利用黑市，打击黑市，取得了显著成效。

边、法币的比价，是落实在比价上，还是落实在物价上，也曾引起热烈的争论。抗日战争结束后，边区银行第一任行长、时任西北财经办事处秘书长的曹菊如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关于金融问题的一些经验》（即“边区金融总结”）的文章，认为“稳定物价不可能，稳定比价必须要。”与曹文相反，时任边区政府经济顾问的黄松令则认为“稳定比价不可能，稳定物价必须要。”边区银行年轻的调研处长苏子仁（即乔培新）初露头角，大胆地对两位权威人士的观点加以综合研究。他说：“最好是基本上用曹的办法，在适宜的条件下，也采用后一种办法。二者宜摘长补短，这

中间须以利益和公私兼顾为原则。因此通货膨胀，灵活限制兑换，利用法币，多赚外面的钱，应当同时并用。”这个问题在 1947 年华北财经会议上才统一了认识。会议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是物价决定比价，而非比价决定物价。但如掌握不好，比价变动亦有可能影响物价。”黄亚光与曹菊如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也认为“物价难于稳定，比价必须稳定。”在实际工作中基本上执行了这一原则。边、法币的比价，边区银行的对策是“不怕你跌，只要你用”。1944 年后边、法币的比价较长时间控制在 85 : 1 元左右，边币的流通范围得到了扩大。1946 年 1 月，根据日本投降后出现的金融变化和物价狂跌的新形势，财经办事处研究并经西北局同意，把边、法币斗争的方针调整为“比价随环境，物价求稳定”。相应制定了停止法币兑出和稳定物价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巩固了边币流通的阵地。

三、陕甘宁边区银行为边区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做出的贡献，是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

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这里已经有一个陕甘晋苏维埃银行（由陕西省苏维埃银行和陕甘省苏维埃银行演变而成）。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党中央将中华苏维埃国家中央政府改称为西北办事处。陕甘晋银行并入国家银行后也相应改称为西北分行，实际还是国家银行总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继承了苏维埃国家银行和陕甘晋苏维埃银行的光荣传统，保存了一批经过斗争实践考验的金融干部，她能根据革命和经济生活的需要确定自己的工作方向和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为机关、部队、学校提供生产自救基金，不失时机地发放农业贷款，积极配合财政贸易，开展货币斗争，等